

□白峰

今年冬天有点冷。微信朋友圈里有人调侃说,哪里是有点冷,是真冷,不过冷点好,能让人年轻,不信你到街上遛一圈,一会儿就冻成孙子了。也有的朋友玩起了以前只有在黑龙江才能玩的游戏——泼水成冰。

可是,这在历史上真不能算冷天。

南宋的杭州比今日之济南要寒冷得多。济南大明湖自从2003年疏浚,形成循环水以来,主水域未出现过全部结冰的现象,这几日开始结冰,成了一景。而南宋时太湖曾经全部冻结,上面可以通行马车。那时候人们可没今日的闲心,没事赶个马车出来玩,那是要运送货物的,分量轻不了。

南宋这次寒冷期,起自北宋末期。苏东坡喜爱吃荔枝,留下了“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常做岭南人”的诗句。他死在1101年,没赶上这次极寒的变化。在他辞世后不到10年的1110年,福州的荔枝全部被冻死了。1111年延续寒冷天气,太湖周边洞庭山著名的柑橘也全部冻死掉。福州的荔枝历史上曾冻死过两次,另一次则是在1278年,一年后,南宋覆亡。

我国历史上曾有过多次气候寒冷期,都比今天冷很多。考古时

罩三国魏晋南北朝,直到隋初才开始缓解,开始进入一个温暖期。唐代就非常温暖了,唐玄宗在皇宫里种植过柑橘,还结了些果实,分给身边的近臣吃。

这次温暖期持续了三四百年,北宋开始转寒,北宋末年忽然大寒。1127年,金兵围困东京开封,是在大年初二。史载,守城的士兵很多冻掉了手指和耳朵。

南宋淳熙十二年(1185年)冬,大雪霰,两月不止,(杭州)冰积尺余不解,台州雪深丈余,冻死者甚众。

我们今日所说的汉唐盛世,其实都是得了天时之助。北方边患多出现在寒冷期,这从气候条件上是可以理解的。

小时候看《草原英雄小姐妹》,一场暴风雪羊群都会被冻死,这在寒冷期其实是经常发生的事。当北方气候寒冷至极,游牧民族的生存就会受到极大威胁,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本无明确疆界,长城就是划分游牧与农耕的分界线,但这是基于战国时代的气候条件下的划分,比如山东的齐长城就是为了阻挡北狄的骚扰而建。长城是死的,气候却是变的,当气候明显转寒,北方游牧民族或者冒死向西穿越戈壁沙漠,或者南迁,无他路可选。气候寒冷期里,农耕线本身就在南退,北方的戍边就成为问题,很难自给自足,供给线变长,孤掌难鸣。

南北朝时期夏霜夏雪的记录很多,五胡乱华就发生在这个寒冷期,北方大部区域都成为少数民族的领地,乃至寒冷期结束。大唐的皇族李氏也是和少数民族的混血,属于鲜卑人的后裔。

元代也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的皇朝。元代90多年的历史中,夏霜、夏雪的年景,在每百年所占比例中也为历史最高,有25年之久。

明代至嘉靖中期气候开始转暖,万历时期是比较温暖的一个时期。就是这个时期,本来盛行于南方的斗蟋蟀习俗出现于北京,说明这大约是南宋以来气候最温暖的一个时期。但是,万历晚期气候又开始转寒,导致陕西大饥,流民遍地,形成张献忠、李自成的大军,这是西北;东北则是女真人崛起并攻入山海关建立大清政权。这场寒冷一直延续到清康熙晚期才结束。

这个时期有多冷呢?史载:康熙三年(1664年)三月,晋州骤寒,人有冻死者;山东莱阳雨,奇寒,花木多冻死;四月,新城、邹平、阳信、长清、章丘、益都、博兴、宁津、东昌等地陨霜杀麦;十二月,益都、寿光、昌乐、安邱、诸城大寒,人多冻死;茌平大雪,株木冻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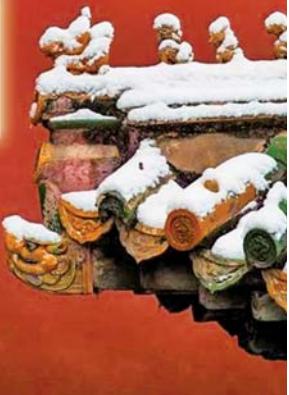
乾隆时期的温暖就有类今日,这也是温病学兴起的一个背景。叶天士、薛生白都活跃在这个时期,及至王孟英在世行医,已是道光时期,此时气候再次转寒。王孟英的医方与温方派又发生了很多变化,因时而变,其遂成一代名医。

我们今日其实是生活在一个大的温暖期之中。这次温暖期是从清末开始的,延续至今已然百年,究竟还能持续多久,不得而知,不是我们自己能说了算的。

我们和古人生活在同一片地域,但却不是同一个时空。在经历了世界范围的工业化、前所未有的工业碳排放、全球普遍出现气候持续变暖这样一些历史上从未经历过的大事件之后,我们生活的世界和古人还是同一个世界吗?但总有些东西仍然是相通的,古人不见今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和古时相较,小环境(地球生态)是在巨变,但大环境(星际关系和运行规律)却没有大的变化,大气候的寒温交替和星际关系的时空位置有关,人类活动能带来部分的影响和改变,但究竟能有多大影响尚不清楚,建立有效认识,尚需时日。

在经历了世界范围的工业化、前所未有的工业碳排放、全球普遍出现气候持续变暖这样一些历史上从未经历过的

大事件之后,我们生活的世界和古人还是同一个世界吗?但总有些东西仍然是相通的,古人不见今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期不算,就从秦代以来,干寒和温热气候交替出现,东汉就比西汉寒冷很多。此情形至东汉末年就十分严重了。徐文兵先生讲《黄帝内经》,提及《伤寒论》,认为汉末、三国战乱频仍,民不聊生,导致伤寒病频发,这样说也不能算错,但其时气候的大幅转寒才是根本原因。

汉桓帝延熹七年(164年)冬,大寒,杀鸟兽,害鱼鳌。

汉灵帝光和六年(183年)冬大寒,东莱、琅琊井中冰厚尺余。

这种情形和三国时期基本类似。

225年,曹丕在广陵(扬州)视察,十万大军演习水军作战,不料淮河结冰,船竟不能动,只得作罢。241年,襄阳大雪,平地雪深三尺,鸟兽死者大半。淮河流域尚如此寒冷,济南会有多冷可想而知。

自东汉而起的这次寒冷期,笼



□雨茂

我一直爱读《三国志》,尤其喜欢《魏书》。曹操确立继承人时有过犹豫,曹植优点十分突出,文采飞扬,出口成章,曹操数次有意立他。但曹植的缺点同样十分突出,任性放浪,饮酒无度,行为不检点,纯粹是诗人性格。曹丕虽没有曹植那样的才华,但他为人稳重,处心积虑,善于收买人心。依曹植个性,并不适合从政,却偏偏对政治感兴趣,迫切想得到继承人的名位。曹氏两兄弟为争太子位,需要拉拢一些手握实权的人替他们出谋划策。下面的人为今后的前途计,也需观风向,下政治赌注,结果自然各为其主。因为立储问题,曹操杀了许多人,比如杨修、娄圭及丁仪、丁廙兄弟,崔琰间接受牵连,最后被赐死;也成全了许多人,比如吴质、贾诩、陈群等;还有人功过相抵,老死家中,比如毛玠。

如果说杨修等人的悲剧是因为公开支持曹植的缘故,那么崔琰就太冤了,因为他明确支持曹丕,为什么也要被处死呢?同样支持曹丕的贾诩不仅活的时间最长,而且还官封太尉,而明显开罪曹操的毛玠为什么能全身而退呢?

由于在立储问题上举棋不定,曹操曾私下询问心腹大臣的意见。崔琰坚持儒家嫡长子继承制原则,公开支持曹丕,“盖闻春秋之义,立子以长,加五官将仁孝聪明,宜承正统。琰以死守之”。曹操是法家思想的拥趸,崔琰却依据儒家春秋大义去劝导,曹操当然不痛快。专制时代面上信奉君权神授,实际上搞暗箱操作,弄得越神秘,对最高决策者的政治安排越有利,崔琰偏要公开化,扬言以死捍卫道义,将曹操置于很不利的境地。听崔琰的话就是遵守道义,反之则不道义,曹操还有选择的余地吗?崔琰将曹操秘密立储的设想公开化,导致曹操很被动,他是在挑战上司的权威,还把上司置于无法选择的尴尬境地。曹操碍于政治稳定的考虑没有处罚崔琰,但心里一定很纠结,这笔账终究会算的。

同样是拥护曹丕,贾诩的态度就高明得多。《三国志》生动地记述了这则故事。一天,曹操屏退左右问贾诩,到底该立谁为太子?“诩嘿然不对。太祖曰:‘与卿言而不答,何也?’诩曰:‘属适有所思,故不即对耳。’太祖曰:‘何思?’诩曰:‘思袁本初、刘景升父子也。’”在立储决策上小心谨慎的曹操心领神会。封建社会设立储君是天大的事,各国君主莫不如履薄冰、慎之又慎,曹操自然也不例外。如果没有特殊原因,依据惯例,顺序继承,一般立嫡长子为储君。曹操长子早逝,曹丕为大,应该册封为太子。另外,借鉴前朝历史,废长立幼容易引起政局动荡,政治

家不会轻易冒险。曹操当然知道,袁绍与刘表都是因为废长立幼导致“覆宗灭国”。贾诩虽然没有明说,但口气并不比崔琰弱,支持曹丕的态度非常明确。为什么曹操高兴地接受贾诩的意见却对崔琰的表态不高兴呢?缘于贾诩的政治智慧及高超的话语策略,还有对上司心理的精准把握。贾诩不露痕迹地支持曹丕,理由不是曹操讨厌的儒家大义,而是要维护曹氏的江山社稷,表忠心的同时将决定权还给上司,曹操当然很开心。专制时代确立继承人,既是国家大事,也是帝王家事,外人一般不要干预,稍有不测就要掉脑袋,建言应该委婉含蓄,不能太过直接武断。崔琰对此并不认同,不能像贾诩那样与曹操意念相通,自然难逃厄运。

再来看毛玠是怎样力挺曹丕的。在太子未定,曹植正受宠爱时,毛玠明智地选择中立,不充当任何人的政治盟友。他曾密谏曹操,“近者袁绍以嫡庶不分,覆宗灭国。废立大事,非所宜闻。”完全站在曹氏集团的立场思考问题,并不是偏向曹丕。曹操正在位上,这些话正是他最想听的,不能容忍属下为了立储君蠢蠢欲动,引起政局不稳。崔琰遭谗言被赐死后,毛玠心中极不高兴。一天,有人告诉他说:“出见黥面反者,其妻子没为官奴婢。”毛玠没好气地说:“使天下雨者盖此也。”毛玠当时心中烦恼,说出此等掉脑袋的话,实属大意,有人向曹操告了密。曹操是法家思想的秉承者,乱世用重典是他的指导思想,严刑峻法成为必然,毛玠依据儒家的天人感应说批评他,曹操当然接受不了,于是将毛玠关进监狱。但曹操并没有立即处死毛玠,大概认为毛玠仍然可以信任,于是派大理寺官员钟繇去审问。掉书袋的钟繇故意引经据典,大谈反叛者被执行黥刑、妻子儿女被没为官奴婢的“历史合理性”,实际上却是避实就虚,为好友毛玠解脱。博学的毛玠理解了钟繇的苦心,并不加以反驳,大谈他这些年做组织人事工作,秉公执法,所以遭到小人陷害,如果诽谤者拿出证据,他就高兴地接受处罚甚至死刑,配合好友演了一场双簧。打小报告本来就很难找到证据,关键在于上司是否采信,并不在证据本身。曹操不想让毛玠因言获罪,加之有桓阶、和洽等人替毛玠求情,曹操借坡下驴,释放了毛玠。毛玠去世之后,曹操亲赐“棺器钱帛”,还安排其子毛机做郎中。毛玠被保全,钟繇功莫大焉,但毛玠心领神会,及时修正了话语策略,也是重要因素之一。

唐人李颀在《别梁锽》中说:“抗辞请刃戮部曲,作色论兵犯二帅。一言不合龙领侯,击剑拂衣从此弃。”留下了“一言不合”的典故。梁锽一言不合之后可以全身而退,但大多数人不会如此幸运。